 浙商研究系列


T
*THE STUDY OF ZHEJIANG
BUSINESSMEN
2012*

浙商研究
2012

吕福新 主 编
张旭昆 副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浙商研究系列

T

*THE STUDY OF ZHEJIANG
BUSINESSMEN
2012*

浙商研究 2012

吕福新 主 编

张旭昆 副主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商研究. 2012 / 吕福新主编.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81140-905-5

I. ①浙… II. ①吕… III. ①商业经营—研究—浙江省 IV. ①F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9321 号

浙商研究 2012

吕福新 主编 张旭昆 副主编

责任编辑 许 静 谭娟娟
封面设计 包建辉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9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905-5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本书编委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委会主任 吕福新

编委会成员 王春福 吕福新 刘海生

李生校 杨轶清 吴高庆

张旭昆 张宗和 金杨华

项国鹏 赵浩兴 韩永学

序

浙商是当今世界之中国第一民商。浙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兴起的百姓商人，大多出身农民；浙商源于浙江“疾虚妄、倡实践”以及民众本位、“义利并举”和“工商兼本”的文化传统；浙商既根植于浙江本土又远征于全国和世界；浙商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抱团经营，成为实力和影响很大的民商群体；浙商既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而迅速崛起，又先行遭遇“后发劣势”而面临挑战；浙商正处于代际传承和转型提升的关键时期。

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是2006年批准设立的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依托于浙江工商大学，对社会开放。浙江工商大学为了整合全校科研资源，提升浙商研究，于2009年10月把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升格为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于是，就有了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和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两个名称。

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的理念和宗旨，是坚持以民众为本位，反映当今世界之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经济全球化以国家现代化为基础、国家现代化以民众现代化为根本的规律，体现知识和理论来自实践、服务实践、提升实践的要求，把商业功利与社会理想、科学知识与人文学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知识创新，以促进当今世界之中国第一民商——浙商的现代化。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的目标和使命，是用全球化的视野，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现代化的全局与高度来观察、审视和研究浙商，成为浙商研究的学术高地、浙商政策的咨询参谋、浙商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导航，促使浙商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人群体。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的学科特色，是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和运用于浙商研究，开展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综合性的平台上进行综合创新，提出

了自主性与相关性统一的完整主体性分析范式,试图创建“浙商主体—环境和生态”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确立了“东方管理思想和浙商文化”“浙商与企业家和企业发展”“浙江民营经济与浙商竞争优势”三个主攻方向,浙商行为与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度、浙商社团组织、浙商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浙商的分支包括温商、台商、甬商、婺商、越商、湖商和杭商等研究内容。同时,采取“四位一体,两个对接”,即学者、商人、官员和传媒人四位一体,对接政府决策和企业实践的工作思路。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从2006年起,每年选择不同的主题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浙商转型研究》《浙商人文精神》《浙商创新——从模仿到自主》和《浙商崛起与危机应对》等论文集。从2010年开始,论文集统一以《浙商研究》为主书名,体现以书代刊。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院长、博导

吕福新
201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篇 浙商总论:主体与生态

主体与生态

- 浙商的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 吕福新 2
-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生态模式
- 基于浙商的视角 吕福新 12
- 文化价值观与浙商财富积累 毛丰付 24
- 专业化交易地理集中、区域市场一体化与浙中内陆城市圈层化
- “义乌商圈”的空间效应分析 娄朝晖 钱 晨 35
- 经济发展、制度环境与就业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考察
- 贵斌威 陈宇峰 48
- 工业化、城镇化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 谢 杰 63
- 中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农业产出效应研究 马淑琴 章辉达 76

第二篇 全球化与浙商

跨国外包体系下技术创新的出口效应

- 基于浙江省制造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 王 俊 黄先海 90

- 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浙江省与全国的对比研究 谢杰 张海森 103
- 中国 ODI 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吗
——以浙江省和广东省为例 马淑琴 张晋 118
- 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测度及其差异分析
——基于产品内贸易分类的跨国数据证据 马淑琴 125
- 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传导机制:基于 LSTAR 模型 陈宇峰 薛萧繁 徐振宇 136

第三篇 浙商政治行为与法律环境

-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有效性的理性分析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 王春福 156
- 民营企业政治行为的文化哲学解读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例 王春福 169
- 社会公共交往领域与公共政策合理性
——以浙江省民营企业政治行为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王春福 180
- 金融改革的法律障碍与司法破解 吴高庆 巩固 189
-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
..... 桂林 陈宇峰 尹振东 195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T Characteristics and R & D 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Manufacture Listed Firms on GEM
..... Yuan An-fu Wang Xiao-feng Huang Jia 212
- A Solution to Under Uncertainty Decision-making
..... Wu Xiao-gang Du Rong-wei 223

第一篇

DIYIPIAN

浙商总论： 主体与生态

主体与生态

——浙商的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

吕福新

摘要:后危机时代的迷茫和纠结,以及作为中国民营经济之代表的浙商的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都归结为主体与生态以及多层次关系和转换提升。

关键词:主体 生态 浙商 严峻挑战 创造机遇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充满着迷茫和纠结,以浙商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同样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并行的局面。究其根源和出路,就在于主体与生态。于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与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世界》编辑部联合,于2012年5月19日在杭州举办“主体与生态——浙商的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学术研讨会。

一、挑战与机遇:冷静和理智认识形势

我们正处于后危机时代,一方面经济开始复苏,出现新的希望;另一方面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甚至暴露出更深刻的矛盾。除了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经济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外,还反映出后现代化与后发现代化的矛盾,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严重失衡等。这是当今时代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矛盾的集中和突出体现。矛盾包含和推动着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说,国际金融危机从发生到今天,问题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变化刚刚开始,改革十分困难。世界经济体系最大的不合理,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应该回归理性,反思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问题,不要认为世界市场是无限的,也不要认为我们所有的出口只要换来美元、欧元、日元就是成功了。而应立

足国内和扩大内需,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培养一个能够消费得起的中产阶级。要解决国内收入分配问题,也受制于全球化。征收高额增值税、财产税等是调整收入分配的最好办法,但是现在各个国家都在降低所得税和财产税,这是为了避免财产和资本流向别的国家。还有,经济调整需要理性消费,但它又不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和本国就业。这些矛盾的充分暴露和展开也为新的生态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强调:目前,世界正值国际金融危机及后危机的多事之秋,也是且更是多事之春。危机催生革命。危机后,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经济这两个生态文明的核心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应对挑战和利用机遇,必须转变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大国,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后发优势已经广泛利用,后发劣势已经普遍显现,正处于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转变生存状态和经济发展方式既紧迫又艰巨。它不仅受体制和制度的限制,也受资源和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的限制,还受素质和能力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产生的民营经济,一方面具有活力效率,体现了民众本位,并已经占有和超过半壁江山,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却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与会者普遍认为,不应把民营经济纳入非公经济范畴,排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经济之外。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拥有特权,享受特惠,扛着红旗,无限扩张,风险可免,而民营企业却受种种限制甚至排斥。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说,占30%GDP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金融资源,而占70%GDP的非公经济只占用了30%的金融资源;垄断企业和银行的利润很高,而民营企业的利润普遍很低。已经拥有大量财产资本的民营企业老板,称自己是弱势群体,缺乏安全感、信任感和归属感。其中,很多人移民国外,用财产资本换取外国绿卡。同时,与会者认为,存在着行政权力膨胀和无限扩张,政策多变和缺乏连续性,执法和行政人员不尽职、不负责任的现象。海南云天森林公园是把自然森林与高端旅游休闲活动神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杰作。该项目启动时,地方党政领导全力支持。该项目与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有关建设用地以及房产证和土地证等手续由政府办理。但是,项目成功了,效益非常好,企业却花了五六年时间也没有把手续办下来。与会者指出,山西浙商煤老板也是类似遭遇,煤炭不赚钱时欢迎民营企业进入,煤炭赚钱时就排挤民营企业。与会者认为,行政权力太大,不受约束,政策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变动性太大,给投资者和经营者造成很大的障碍、困难和损失,是反生态的。这是造成经济碎片化和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同时,整个社会普遍过分追求物质,物欲横流,急功近利,造成社会对立和环境污染,仇官、仇富现象比较严重,社会文化生态扭曲。周冠鑫

说,现在许多民营企业企业家很怀念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创业和致富很光荣。而现在,创富光荣变成了仇富有理。这既有民众心理和社会舆论问题,也有民营企业老板自身的素质、修养和行为问题。温州龙湾区委常委、副区长崔砺金说,有的老板,企业做大了就以势压人,说跟书记、市长很熟,迫使政府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官与商的关系缺乏透明规范,潜规则盛行。还有,一些新闻舆论不负责任,随意报道和任意夸张。许多与会者认为,社会普遍缺乏道德底线,缺乏理解和尊重,缺乏敬畏和信仰。

但是,中国后发现代化以及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正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机遇。农耕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自然历史基础,世界上唯有中国的农耕文明保留得最广泛和最完整,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文明的真正的后发优势。张孝德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认为,工业文明离中国远,生态文明离中国近。生态文明时代,真正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福星。中国可以在未来引领世界生态文明革命。西方的低碳经济是以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方式为前提的,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中国有优势,但也有挑战。

浙江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率先开始市场化,先行利用后发优势,获得超常的快速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浙江也先行遭遇了后发劣势,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是长期性的,压力和挑战很大。同时,压力可转变为动力,危机包含着转机。何况,浙江省已经形成了先行的后发优势,有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即生态文明的发展机遇。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教授指出,应理性地看待浙江经济增长进入低迷状态这一现象,政府必须冷静。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了 30 多年后,原先的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已经慢慢失去,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大幅上涨,出现了资本的大量外流,有几万亿资本在为全国市场经济发展作贡献。这具有必然性,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经历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反而有利于浙江省缓解土地和环境包括国际市场环境的压力,促使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但是,浙江省的高端生产要素严重缺乏。很多与会者都指出,浙江省经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已经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已经出现了许多生态文明的生动事例。张孝德说,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政策都领先于全国。生态文明为浙江企业家和企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浙商源于浙江省,立足于浙江省经济和文化,突出地反映浙江省作为中国后发现代化之先行地区的特点,又走出浙江,超越浙江省经济和文化,广泛和充分地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全国化的趋势与进程。浙商,在先发地利用和形成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先行地遭遇后发劣势,面临诸多挑战。这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国际市场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内市场不规范和竞争

加剧的挑战,资源和要素价格大幅上升的挑战,以及浙商企业自身先天不足的挑战。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在系统地阐述浙商面临的诸多挑战时强调指出,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很低,还低于银行的利润率,而且企业规模小,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产业层次低,产业布局和组织分散,竞争和自主创新能力弱,很难提高获利水平,而且工资涨幅很大,形势和挑战都非常严峻。同时,浙商也有很好的发展机遇。这主要是全球经济大调整和大变革,全国工业化提升和城市化加快,以及浙江省实施国家四大战略和四大建设等带来的机遇。但是,这些机遇已经不是先前那样可以简单模仿就能利用,而是需要系统地创新和创造才能利用。

总之,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既非常迷茫和纠结,又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代。

二、出路与选择:主体和生态转换提升

我们要冲破迷茫和打开纠结,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其根源。这一方面因为工业文明是人类的重要文明形态和必经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是发展工业文明的自发和强有力的自然社会形态。人类的工业文明时代还没有结束,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虽然工业文明会给资源和环境等带来破坏,资本主义会加剧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对立,造成严重的危机,但是我们不仅跳不过和避不开,而且由于我们传统的文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是相对落后的,封建因素的影响还很大,物质欲和权力欲强烈,普遍的急功近利和特权关系,经济和社会效果比较差,资源和环境破坏相对更为严重,我们还得继续开展甚至加强工业化,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技、组织和管理等。这是全球性的使人迷茫和纠结的严重失衡的经济社会生态。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基本形成了市场生态,民营经济大量产生和普遍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经济规模和实力大大提升,并形成相对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态,但是行政和行业垄断以及各种特权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泛滥,体制和制度障碍相当严重,国有企业强力扩张,民营经济和生态受到挤压,深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呼声与发展要求非常强烈。但是,体制性、制度性的障碍与阻力非常强大,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严重扭曲。这是全国性的使人们迷茫和纠结的失衡扭曲的经济社会生态。与会者普遍认识到这种双重的迷茫与纠结。

经济社会生态,是指企业和人们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的整体生存状态。一般的老百姓和民营企业,是离不开和很难改变这种生存状况的,所

以会感到迷茫和纠结。于是,也就有很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会随波逐流,只顾私人和眼前利益,顺从现行体制和制度,尽可能地寻求特权关系和谋取特殊利益,从而会扩大和强化不良的生存状态,导致生态的进一步衰落或衰败,使人们更加迷茫和纠结。与会者普遍反映了这种担忧。

实际上,生态不只是全世界和一个国家的人们和企业的整体生存状态,也可以是老百姓和企业的群体生存状态,甚至还可以是个人和民营企业的个体生存状态。虽然大生态起总体的决定性作用,但小生态也会影响大生态,促使或导致大生态的演变。不仅如此,生态还有层级性,除了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等的层级性外,还有反映社会自然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的不同文明生态的层级性。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层级的社会生态。政治和制度生态,决定着当下整体的经济社会生态。但是,反映生态文明的局部、群体、企业和个人的小生态,是高层级的,虽然在当下不起整体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未来起导向性作用。

生态不只是外在于人和企业的生存环境,而主要是人和企业等主体与环境的融合状态,主体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主体,是权利和义务的发动者与承担者,是现代化的基石。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市场和社会主体是自发成长和逐步成熟的。在规则公正的环境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协同发展的。但是,在后发现代化中,一方面由于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市场主体可以迅速和大量地获得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局限,缺乏公正的规则和竞争,市场和社会主体尤其是特权者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从而造成普遍的权力欲膨胀和义务感薄弱。这也是造成迷茫和纠结的重要原因,是多数与会者的共识。但是,那些有理想、有觉悟的市场和社会主体,却在实践中利用后发的文化优势,经过历练和洗礼,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传统美德,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现代文明,具有现代精神,甚至统一反映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初步形成和发展了健全的主体性能。这样的主体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责任感和创造能力,并通过互动和协同,形成高层级的小生态。已经有一批浙商初步成长为这样的主体,并在促使和推动市场、社会、自然和文化生态的改善。郭占恒指出,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许多浙商企业快速成长,涌现出了若干跨国公司;私人资本社会化加快,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总之,现实中存在着多重和多元的主体—生态关系。它集中体现在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上。我们必须推动和促进主体—生态的转换提升。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主体与生态——浙商的严峻挑战与创造机遇”这个主题提得好。《管理世界》编委会常务副主任蒋东生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离

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浙商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今年的会议主题非常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已经遇到生态和环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解决好了这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问题,就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不然,不仅是企业和企业家不能发展,而且还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主体—生态的转换提升,是指主体与生态协同转换提升。其主要目的和内容是使落后和失衡扭曲而趋于衰落的主体—生态,转换为先进和平衡协调并趋于进步的主体—生态,从低层级的主体—生态提升到高层级的主体—生态。首先,是经济和金融主体—生态的转换提升,关键是民营经济和民营金融主体地位、权利、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国有经济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打破或减弱,有利于对国有企业进行行为设置和实行监控,并建立公正的规则,从而形成有效竞争和协调发展。张仁寿、周冠鑫和崔砺金等,都从主体与生态两方面阐明经济调整和金融改革,既强调打破国有垄断,防止国有机构操控民间金融,又强调民企提高素质,防止民间金融走偏方向,过分投机和牟利,进而削弱实体经济。

主体—生态的转换提升,必须体现在社会文化中。这一方面是既肯定和尊重市场主体的社会地位,客观和公正地看待与评价其经商、创业和致富,又善意地批评了市场主体的缺点或毛病,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必须公正处事;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必须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不显富摆富,不过分奢侈消费,着力提高素质和能力,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关注和帮助弱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张仁寿等认为,政府应该转变社会角色,不应再过多地作为市场和投资主体,而应该主要成为公共主体,制定公共规则,创造公共环境,打造公共平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周冠鑫等强调,主体与生态息息相关,浙商应洁身自好,社会民众和舆论不要对浙商的一些缺点夸大化和妖魔化。

主体—生态的转换提升,应该提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生态文明是一个新时代,有伟大的发展空间和前途。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主体—生态,朝着生态文明的方向转换提升,既要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换提升,也要有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转换提升,还要有人格结构和主体精神的转换提升。张孝德说,在前30多年,浙商首先觉醒,成为市场的开拓者和播种者。在新文明的春天里,浙商能否再创辉煌,不是取决于你今天收获多少,而是取决于你怎么播种,为未来播多少种子。为此,浙商的主体精神必须再觉醒,要从收获转变为播种,从把财富顶在头上转变为把财富踩在脚下,从天上回到地上,要以民族文化为根,发挥东方文化优势,整合东西方文明,树立新的财富观(包括对大自然的感恩之财,有益于社会 and 人类健康、幸福发展的吉福之

财,有益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顺泰之财,有益于社会边缘群体改善的仁善之财),从原罪财富向吉善财富转型,从模仿转变为创新,成为新生态经济的原创者。浙商应成为需要用全脑智慧和全脑思维创造吉财的生态企业家。同时,张孝德和毛剑锋等与会者强调政治生态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应把主体一生态提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

三、对策与举措:改革改造和创新创造

主体一生态的转换提升,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和举措。这主要包括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创新创业和价值创造,传统文化继承改造与现代融合创新等。侯云春强调指出,我们应更多地向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等要增长、要效益。浙商作为一个最有活力的群体,应创造新经济、实现新发展。

1. 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已经进入了危险的深水区,此时,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方向,抓紧时间深入体制改革,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周冠鑫等非常强调这一点。消费日报社理论部主任叶培红等与会者认为,体制改革不能太多地寄托于政府。浙商从产生以来就往往是挑战现有体制的。周冠鑫说,浙商是草根起家,从来都是依靠自己,力所能及地改变体制环境,改造生存状态。这是浙商的生存之道。不是抱怨,更不是简单地去对抗,而是理性地行动,多点建设性。但是,浙商和其他民营企业主已经从贫穷变成了富裕,必须超越既得权利的束缚,克服或战胜保守性,并从市场主体提升为社会主体,联合其他有良知的社会人士,为了长远的发展而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消除把民营经济作为非公经济的歧视性,至少是扩大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把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资本社会化纳入公有制的范畴。同时,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必须具体可行与切实有效。郭占恒强调,落实新老“三十六条”,必须抓紧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政府应减税,部门应减费,金融应减息。为此,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张仁寿说,温州金融改革,基本不触动整个旧的金融体制,是走不下去的。金融是一体化、标准化和流动性非常高的,不可能在温州这一个区域里创造新的金融生态。同时,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要有系统性与延续性,避免造成障碍与隐患,防止行政和司法人员借口推诿,以及对老百姓和民营企业的实际损害。万事利集团公司总裁李建华强调,政府出台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

2. 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创新

产业组织创新、优化和转型升级,既是企业自觉行为的结果,也是产业生态演进的产物。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结构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新的产业组织理论则强调,企业行为决定产业的组织结构,进而决定产业绩效。而我国的现实基础和时代环境,决定了新旧产业组织理论都有其实用性,这正反映主体一生态的转换提升的要求。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娄朝晖在题为“机会主义成长、浙商产业链位势及其转型升级路径”的发言中,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市场化不全面和不规范以及机会不均等,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包庇企业偷税、漏税和作假等,就不会有真正的淘汰,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产业进步。同时,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之所以艰难,也是由于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产业组织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海舰说,从国际背景看,一方面是产业分工高度细化,已进入到产品环节或区段分工;另一方面又把产品研发、制造、营销、营运等不同环节或区段作为产业来经营,产生躯体产业和脑袋产业,以及小脑袋产业和大脑袋产业。从分到极致,再整合起来,形成价值网络体系,叫独立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而我们的企业是做大而全,在实体上做大。现在应该换一种思路,把虚拟的无形的价值网络做大,把势力做大。在价值网络体系里,企业应尽可能从模块供应商提升为系统技术商,再提升为系统经营者。其实,价值网络是高层级的经济生态。浙江省打造虚拟的价值网络体系,具有电子商务生态优势。阿里巴巴市场分析师晴檬指出,浙江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位居全国前列,电子商务服务业也遥遥领先。与块状经济紧密结合的行业电子商务网站,浙江省居全国第一。还有,无形的电子商务市场与有形的专业市场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和转型升级。

商业模式创新,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来源和途径,以及要素、结构和方式等的创新。很多浙商创建和形成具有显著特点和明显优势的商业模式。传化科技城科技创新发展公司总经理黎恒说,传化物流是打造和运营供第三方物流企业利用的物流生态网络。传化科技城是以网络化、生态化、整体化和城市化的方式,集聚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进行科技生态包括要素、体系、机制和环境,以及研发、创意、办公和服务等的系统经营。浙江工商大学科技处副处长范钧教授提出,运用“聚合碎片”这一前沿的学术思想,针对浙江省存在的制造、销售和服务等的碎片化现象,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把有效的需求碎片和供给碎片整合起来,提供标准化和低成本的服务。这与网络化和生态化的平台商业模式是一致的。商业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其关键是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成长及创造性的发挥,与企业内部和外部生态环境的优化。浙江一